

金以林，《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：蔣介石 「最高領袖」地位是如何確立的》

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9。465頁。

王克文*

國民黨從1920年代中到1930年代初的黨內紛爭，不僅嚴重影響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進程，也埋下它日後喪失政權的種籽。長期以來，有關這段歷史的論述相當多，即就中文著作而言，從半史料性質的《反蔣運動史》(1934)、半回憶錄性質的《卅年動亂中國》(1955)，到過去大陸學者張同新的《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略》(1982)和郭緒印的《國民黨派系鬥爭史》(1992)等，都對此一課題作過很大貢獻。本書在上述一系列論述的基礎上，更深入地考察了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，其史料徵引之豐富與史事敘述之周密完整，不但遠遠超過以往的著作，而且在未來一段時間內，相信也無書可出其右。

本書書名雖然涵蓋甚廣，內容也從孫中山逝世談起，但重點則在1931年的寧粵分裂。書中除第一章回顧孫中山死後五年間蔣介石、汪精衛、胡漢民三人角逐大位的概括經過外，其餘諸章均集中探討蔣、胡二人1930-1931年間的分合，包括二人在約法和國民會議問題上的分歧、蔣氏扣胡的湯山事件、廣州反蔣的非常會議、寧粵對峙與上海和談、分在三地召開的國民黨四全大會、蔣氏下野與東山再起，以及九一八事變後的汪蔣合作等，每個環節都敘述詳盡；最後一章則從地域觀念的角度，對這段歷史作出總結分析。作者在觀察國民黨

* 美國聖邁可學院(Saint Michael's College)歷史系教授

派系時，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念，即把與蔣介石並立的黨內勢力稱為「派」(faction)，而將蔣氏領導下的小團體稱為「系」(clique)；寧粵分裂的結局，確立了蔣介石「最高領袖」的地位，使國民黨自 1920 年代中以來各「派」爭做孫中山繼承人的惡鬥告一段落，此後轉為蔣氏之下各「系」之間的分立競爭。寧粵分裂因此在國民黨內爭史上具有分水嶺的意義。

本書最出色之處在於史料的搜集、爬梳、徵引與比對。作者首次大量使用近年公開的蔣中正檔案（包括蔣介石日記、籌筆、史略稿本等）、閻錫山檔案、國民黨歷次中央會議的速記錄，以及有關人物的回憶錄或口述歷史，使寧粵分裂的內幕得到空前詳盡的展示，相較於以往論述大半倚賴宣言或通電而作鋪陳，實有驚人之進步。其中尤以對蔣介石日記的引用，呈現了過去最欠缺的蔣氏個人觀點，為研究這段歷史開拓一片新視野，也令其他治史者受益匪淺。如日記中所透露蔣氏下野前後內心的猶豫、對情勢的觀察和揣測、與屬下之間的聯絡和布置等等，均屬前所未聞，讀來引人入勝；又如蔣氏扣押胡漢民之前數日，在日記中對胡氏所流露之極端憎恨，可與他在中山艦事件前夕的日記對照，頗有助於分析其猜疑躁戾之性格，以及使用暴力前自我合理化的心理過程。

除了寧粵分裂的經過以外，書中對華北軍事政治形勢的描述，尤其值得注意。第六章探討非常會議期間，華北各派軍人利用國民黨內爭的新局面，擴張本身地盤，第九章則分析蔣介石被迫下野前後，華北各派軍人企圖取張學良在平津的地位而代之，都是以往類似研究中著墨不多的課題。作者主要根據閻錫山檔案中的往來文電，配合蔣中正檔案和其他相關材料（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馮玉祥檔案），將當時閻錫山、馮玉祥、石友三、韓復榘、孫殿英、吳佩孚，乃至甘肅馬家軍之間密通消息、蠢蠢欲動的情況，作了前所未有的仔細陳述：閻、馮交結汪精衛，蔣介石則拉攏張學良，成為華北兩股對峙的力量，九一八事變後，張氏喪失東北地盤，不但為國人所不諒，而且頓時成為華北其他各派的圍攻對象，但基於上述淵源，寧粵合作後蔣氏仍力挺張氏。從本書的精彩描寫中，至少可以看出下列幾點：第一，國民黨的內爭始終與地方軍事勢

力有著密切的關聯，明瞭了這層背景，吾人對其後若干發展，如次年(1932)日軍進攻熱河時，汪精衛要求張學良「共同下野」，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在晉陝交界剿共的困境，乃至抗戰期間汪精衛向日方表示閻錫山將可參加「和運」等等，才能豁然貫通。第二，蔣介石操控地方軍事勢力的手段，除合縱連橫外，最關鍵的還是銀彈攻勢（蔣氏只對手無寸鐵的政敵使用暴力，如中山艦事件和湯山事件，對坐擁重兵的軍人則極少動武），他總能向爭取對象提供及時而大方的財力援助，使其倒向自己；此點固非新論，但本書透過蔣氏與宋子文等人的文電往來，為以往學者（如 Parks Coble, Jr.）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具體的例證，也令人對蔣宋之間的共生關係有了更深的認識。第三，國民黨在南京時期的統治，就華北而言，究與北洋時期有何本質上的區別，值得重新思考；研究民國軍閥史的 Edward McCord 即曾指出，國民黨治下的所謂「新軍閥」或「軍閥餘孽」，與北洋「軍閥」可能僅是用詞上的差異，所描述者實為同一現象。南京時期各派軍人在口頭上都宣示效忠三民主義（正如北洋軍人之擁護「法統」），而其生存方式、彼此之間的互動，以及與中央政府的關係，一如既往。從此一角度看，北洋與南京時期的「斷代」無甚意義。本書對華北軍事勢力的描述證實了這項推論，作者在書中雖對蔣氏與地方軍人的關係作了簡要分析（頁 68、208-209），但其背後的歷史含義似可進一步引申。

作者鑽研寧粵分裂多年，從學士、碩士到博士均環繞此一課題撰寫論文，如今大著問世，果然精彩，其重要性已如上述。不過若欲挑剔，本書亦有美中不足之處。首先，寧粵分裂這段歷史，治國民黨史者都不陌生，其基本輪廓已經確定，本書要想有所突破，一是增添新的史實，二是提出新的解釋；上述有關華北形勢的描述，可視為史實方面的突破，但在解釋方面本書則稍嫌薄弱。末章以地域觀念解釋 1920 年代中到 1930 年代初的國民黨內爭，並未超越吳振漢《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》(1992)之論點，而吳著的架構似更博大，分析也較深入。其實 1920 年代中到 1930 年代初是國民黨史上一個重大的轉型期，就統治範圍言，它從廣東一隅擴展為全國性的政權；就領導者言，它從孫

中山過渡到蔣介石；就思想傾向言，它從鼓吹社會經濟變革蛻化至維護既有的社會經濟秩序。此一轉型動盪起伏、影響深遠，而派系鬥爭正是這個轉型過程的一種反映，因此探討這段時期的派系鬥爭，可能需要更廣闊而細緻的分析架構。至於廣東派和江浙派的地域之爭，在寧粵分裂一事上固較彰明，卻無法充分解釋國民黨內長達六、七年的互鬥；即以 1925-1926 年的西山會議派和 1927-1930 年的國民黨左派為例，均顯示其他因素（如「世代交替」或意識形態）在派系運作上至少同樣重要。順帶指出，1927 年左派的「粵方委員」並非「粵籍委員」，作者不應混為一談（頁 56）。另外，作者在緒論中說明本書希望釐清的兩個具體問題，是為何孫科的「太子派」會在寧粵分裂中崛起，而西山會議派又為何在這次事件後消失，然而末章並未就此提出明確答案；書中有關這兩個問題的敘述，也僅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

其次，本書之可貴在於大量引用蔣介石日記、事略稿本及《困勉記》、《省克記》等自述性史料，然而在引用時，似未進行足夠的分析。蔣氏在日記中言及身邊諸人（如吳稚暉、戴季陶、何應欽等）意見不同，作者很少加以解釋，其實他們與蔣氏的關係和各自態度的形成，也是派系政治的一個層面。更重要的是蔣氏對本身立場和處境的描述，作者往往只冠以「蔣氏自省道」等語，便節錄原文，有時甚至以大段日記代替一節的分析或結論，使人以為作者認同蔣氏的觀點，本書也幾乎成為「蔣介石眼中之寧粵分裂」。從這點來看，本書與過去張同新、郭緒印等人著作的最大不同，或即過去的著作對蔣派和反蔣派均持批判態度，而本書則明顯偏重蔣氏立場（除蔣氏本人所言外，書中也引錄董顯光等諛蔣之作而據為信史）。其實蔣氏的這些「自省」，固為研究蔣氏的性格、心態與政治手腕提供了難得的視窗，但作為當時情勢的描述卻並不客觀，若不予以點明，易使讀者產生誤解。舉例而言，蔣氏掌權不過數年，日記中卻已完全將自己與「黨國」或「革命」等同，自信「無人能勝此重任」（頁 258），對資望高於自己的挑戰者則毒言咒罵（「胡逆之肉，其足食乎？」）（頁 391），以為反對自己即是「動搖國本」（頁 253）和「滅亡本黨」（頁 272），及至

四面楚歌，又謂「嗚呼，人心已死，可歎孰甚！」（頁182）此類文字所反映的只是蔣氏本人的狂妄，豈能默認為實況？人們喜言「讓史料自己說話」，其實史料自己並不會說話，它如何說話、到底說了什麼話，全賴治史者的引導和解釋，這也是治史者的責任。

於此不能不對蔣介石日記的價值再談數語。自蔣氏日記公布以來，學者趨之若鶩，掀起一股熱潮，但對歷史人物日記的使用方法，似未見充分討論。中國名人寫日記的傳統，除記述見聞外，尚有修身自勵及留傳後世兩層想法，故內心或生活之隱私未必付諸筆下，而冠冕堂皇之語猶多。蔣介石最崇拜曾國藩，曾文正公日記著重養煉心性，當是蔣氏寫日記的範本；而從毛思誠《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》中已引錄蔣氏日記及《自反錄》等冊之編纂來看，蔣氏寫日記也本有公諸於世的打算，這些都會影響到日記的內容。日記中之「自省」，究係覺得在道德規範或政治考量下「應該」如此自省，還是希望後世「看到」他如此自省，正可推敲，若純以「自省」視之，未免過於天真。再者，日記固然可貴，總是「一家之言」，撰者若為歷史事件的旁觀者（如《王世杰日記》或《邵元冲日記》），對研究某些歷史事件自有重大價值，但也得考慮撰者的立場與背景，若撰者即是歷史事件的主要當事人（如《周佛海日記》），則必存偏見，尚需與其他各方材料比對，以求全面及平衡。在近代中國的政治領導者中，孫中山、毛澤東、鄧小平均未留下日記，蔣介石的日記因此格外稀罕，而其解禁之時機，又恰逢大陸史學界興起為蔣介石與國民黨「平反」的翻案風，於是推波助瀾，一時間蔣氏日記似乎成了解答國民黨史上各項疑難之鐵證。其實未必盡然，蔣介石的「夫子自道」，使用起來仍須審慎。